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第8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 编

(第8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 8 辑/章开沅 严昌洪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622-5233-7

I. ①近… II. ①章… ②严… III. ①中国历史: 代近史—研究—丛刊
IV. ①K250. 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121 号

近代史学刊 第 8 辑

主 编: 章开沅 严昌洪◎

责任编辑: 沈继成

编 辑 室: 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80mm×1230mm 1/16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数: 1-1000

责任校对: 张晶晶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电话: 027-67863220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督印: 章光琼

印张: 10.5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辛亥革命研究

- 徐保安:晚清启蒙思潮中的开官智言论浅析 1
- 赵炎才:中国近代理想人格的话语诠释
——以辛亥前革命志士为中心 13

基督教研究

- 张永广:条约制度与近代中日开教 28
- 徐炳三:沦陷前东北基督教教育述评 36

中共党史研究

- 王建伟:中共早期的“反帝”口号及其所引发的争论(1921—1925) 48
- 申国昌: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冬学运动研究 59

专题研究

- 王建革:多因素影响下吴淞江流域的土壤环境(1750—1950) 68
- 李欣荣:同途殊归:钱穆、张荫麟通史观之比较 84
- 洪振强:娱乐、消费与政治:1929年西湖博览会 98
- 魏文享、岳奎:专业群体与知识转型,
——1933年前后职业会计师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论争 110
- 吴志国:挽救身份:五四抵货运动中的简照南恢复国籍案 125

书评

- 徐旭阳、张泰山:农会视角下的党农关系
——评魏文享著《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研究(1924—1949)》 136

研究述评

- 彭涓涓:寻找中国明代的商业文化
——从西方汉学家新著看中国商业文化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145
- 郑成林、刘俊峰:近代汉口金融史研究述评 152

晚清启蒙思潮中的开官智言论浅析

徐保安

内容摘要 晚清除开民智以外，还有开官智。清季有关开官智的言论以清末新政的推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为第一阶段，开官智思想存在着中学教官还是西学课吏的争论，且争论局限于政治高层，社会影响不大。清末新政时期为第二阶段，西学开官智成为主流。在这一阶段，统治阶层关于开官智的言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面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灼与慌乱，而以《大公报》为中心的社会舆论则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各界对开官智的倡导及政府主导的规模颇大的开官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近代早期启蒙的主题，在中国特殊国情下，让官员学习西学，以官智推动民智当然也应该是启蒙运动的可行选择之一。

关键词 开官智 启蒙思潮 清末新政

在对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进行研究时，学界习惯以“开民智”作为论述对象。但事实上，清末除了开民智以外还有开官智。

在官员应否或能否成为启蒙对象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在‘知识’的逻辑上，承担着启蒙的权利。而权势阶层在‘权力’的逻辑上，决定着启蒙的权力。”在谁需要启蒙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会把启蒙的目光一起瞄准社会的下层。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的下层被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毫不商量地、毋庸置疑地塞进了启蒙的‘囚车’。他们都把自己从‘启蒙对象’中优先地提取出来，放置在他们选定的‘启蒙对象’之上，以‘知识’的优越与‘权力’的威严成了启蒙的‘训导员’和‘判官’”^①。

该学者的判断多少存在着失实之处，因为开官智的确被纳入了清末启蒙思潮的视野，且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颇具规模的开官智运动。其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启蒙运动发生的‘特定时刻’规定了名为思想启蒙的运动实则以明确的政治目标为指向”。中国启蒙运动“其复杂性较之欧洲启蒙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客体则一直不甚清晰，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事实上都被列入被启蒙者的行列”^②。清末的官员

① 颜德如：《“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闫润鱼：《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规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群体能否目之为精英或许有待商榷,但清末官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却是不争之事实。“开官智思潮是中国传统‘吏为民师’观念与近代中国特殊际遇相结合的产物。几千年传统把官员的地位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为民之父母,普通百姓唯官员之马首是瞻。因此,当近代中国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挑战时,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官员,把官员作为了挽救时局的希望。可是,智识低下、愚昧保守的封建官员群体不能担承救国纾难的重任,于是,开官智便进入人们的视野。”^①在启蒙的大背景下,在开民智的历史场景中,舆论界提出了“开官智尤急于开民智”^②的口号。本文拟以时间为序,纵向探究晚清开官智言论发生、发展的大致线索,以期对晚清各界在官员这一特殊群体启蒙问题上所提出的主张进行初步梳理,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就现有的材料看来,“开官智”一词的发明权应当属于梁启超。梁在1898年《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到“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所以“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③。清末新政开始后,《大公报》以“开官智”为题组稿讨论,开官智遂成为当时的时髦语汇。但是如果我们把“开官智”理解为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话,那么开官智应当起于洋务运动初期,对于开官智即让官员接受再教育的议论也发轫于此时。戊戌时期改革、保守各派都对此问题发表过见解与主张。新政时期统治阶层的声音与社会舆论的吁请共同把开官智言论推向了高潮。

让正途出身的官员接受再教育的想法最早萌生时,无人有开官智之“主观故意”。洋务运动初期,以奕訢为首的洋务官员认为西方制造之法多出于天文算学,为适应改革急需洋务人才的形势,奕訢等于1866年提出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官员入学。奕訢等提出让官员学习,其原因无非是官员年龄较大,“研经有素,善用心思”^④,因此可以胜任学习天文算学这类高深学问之责。后来在与倭仁等保守派论战时,奕訢等人指出,正途人员皆“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⑤,可不受洋人引诱,不致误入歧途。但在当时,熟读经籍的士大夫们认为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这等“奇技淫巧”是“矜奇好异”,是“舍中法而从西人”;而中国官员请洋人为师更是奇耻大辱,不成体统,不可接受^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中一部分人对西学的认识逐渐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了制度层面,诞生了所谓早期维新派。体现于开官智,即对学习西方的内容不再限于“制造之巧”,而是注意到了“政教之殊”:“于各国政教之殊得而察之,洋人制造之

① 崔军伟、徐保安:《晚清开官智思潮述论》,《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

② “论说”,《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

③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④ 宝鋈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502页。

⑤ 宝鋈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582页。

⑥ 关于奕訢等人在让科甲正途人员入学天文、算学时的努力及遭遇的阻力情况,可参见徐保安:《试论清季官员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巧得而知之。”^①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让官员学习以提高自身素质应对时局的观点并无人根本反对，关键在于学什么。既然有人认为西方的“奇技淫巧”不可学，那么让官员熟习例案，研究中国传统官员必须通晓的理事安民之道，学习内容以中国律例与传统经世之学为主，这一开官智的主张就自然被提了出来。1866年5月，翰林院检讨董文焕提出“内外臣工讲求律例”以防止劣幕奸胥“把持蒙蔽”的倡议^②；1880年，郑观应出版了36篇本《易言》，该书针对当时官员不通律例而致使书吏弄权的弊端，提出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摘其要旨，分门别类，“纂勒成书，颁行天下，俾官吏共习”^③，如此，官员能力提高，事权则不致下移；1882年6月27日侍郎宝廷上折哀叹八旗人才消乏，提出要在各部设“学例馆”，让初登仕版的八旗官员学习案例以提高理事能力^④；1887年，刚毅上折时称自己历任各省期间“必以开馆课吏为第一要务，每日传集在省候补及部选初到各员，分班到馆”学习居官办事之法以及《牧令须知》、《秋谏辑要》诸书^⑤。

1895年7月，甲午海战失败后，洋务理论集大成者张之洞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时提请当局注意人才的培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官员游历。张认为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效不著的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徇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要打破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但是，张在论述选派“翰林、部属及各项正途出身之京外官”出洋游历的原因时，提到“盖以科目进者，平日诵法圣贤，讲明义理，本源固已清明，不过见闻未广、世事未练”而已，因此派他们出洋即可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切于实用多矣”^⑥。对于“本源”是否清明的强调，说明张之洞的开官智思想并未突破“中体西用”之框架。

就在张之洞仍强调本源清明时，康、梁等人的开官智言论则有了新的亮点，即以此为维新变法服务。1898年4月，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出“开官智”“为万事之起点”的观点，认为官员若从未接触过新知识，“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让他们经手变法则绝不会成功。对这些智识低下的官员要设课吏堂“教之”，“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每日到堂检查功课，随时教诲。学习内容为“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并在堂中“多备报章，以资讲求”^⑦。同年6月，康有为提出让“枢机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抚”“游历外国，博地球之大观，使知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仍削，深通其故，显豁无疑，

① 郑观应：《论出使》，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637页。

③ 郑观应：《论书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340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2239页。

⑥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9~1000页。

⑦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9~180页。

而后推行新政,可无滞碍”^①。可见,康之开官智主张是以扫除变法障碍为目的的。康提出的开官智主张还有“设报达聪”一策,称“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同时广购各国报纸,“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②。可见康、梁要让官员学习西学,了解西方大势,是为变法维新服务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了官员入大学堂学习的方针:“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③这一纸诏书表明开官智的主张已得到最高层之认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被委为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孙于8月9日上疏提出设“仕学院”的主张:“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也。”在孙看来,科甲出身之官员,“中学当已通晓,其入学者专为习西学而来,宜听其习西学之专门”^④。

可是,当康、梁等人大力提倡开官智以扫除变法障碍时,其政敌们却匠心独运,同样以让官员学习的方式来破坏变法。在一些满族大员看来,康、梁等汉人在戊戌时期呼风唤雨,满员却无力应对的原因是满员有真才实学者太少。1894年,刚毅调京任职,曾先后在工部与刑部考试满员。这一做法启发了内阁侍读学士荣庆,1898年2月15日,荣上书认为汉员多有真才,而满员进身太易有实学者少,故“欲振天下之人才,尤当自八旗始”。荣庆提出阁部院寺堂官要将本衙门满档房、典籍厅、司务厅等处作为储才之地,让满员学习列圣训谕、历代先正格言、典章政要、治谱律例、名臣奏议等课程,“旁及公法条约、测算制造并西国近事时务报章”。学期满后严格考试并将成绩作为派差、升黜的依据。本来让满员加强学习、提高满员素质并无不妥之处,但要害在于,荣庆认为这样一来人才自会大兴,“不必擅议改章,矜言变法”。联系到当时改良、保守间的争论,可知荣庆绕了一大圈,其开官智的主张其实是以反对变法为目的的。所以,已倾向于改革的光绪帝当然不会完全赞同荣庆的主张,他在上谕中质问:“旗员既须考试,汉员何独不然?”将荣庆所提满员学习的建议推广至各衙门满汉司员“一体面加考试”^⑤。上谕只字未提官员学习与变法的关系到问题,其实是间接驳斥了荣庆取消变法的主张。

戊戌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慈禧于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推翻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成果。西学开官智的主张被迫消沉下去,但中学开官智的思路却并没有中断。

首先,京师大学堂仕学院如期进行了招考,但教学内容已与先前入学“专为习西学而来”大异旨趣了,“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然后再学习兵农工商以及格致、测算等学^⑥。“竟竞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

① 康有为:《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代宋伯鲁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1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书店2000年,第17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书店2000年,第435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4042页。

⑥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1998年,第1245页。

书以为的。”^① 圣经理学成了主要课程。

其次，政变后的慈禧亦认识到了开官智的重要性。1899年10月9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谕指出，州县有“牧养小民”之责，但对州县的“训教”却“责在上司”，“大吏当以师长自居，视属吏如子弟，先教以端趋向，再教以习科条”，只要“上司事事考究，属吏自人人奋兴”^②。这种官大即智高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端趋向”、“习科条”的教育内容与以长官为师的教育方式亦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政变后的官员教育思想已经大大退步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末新政前，开官智、让官员接受再教育已经成为大清政坛时常议论的课题。为此，政府新旧两派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线：即西学（学习西方新知识）开官智与中学（传统理事安民之道）开官智。戊戌政变标志着中学开官智的暂时胜利，以西学教育官员的努力被迫转入地下。从启蒙的角度来看，西学开官智无疑代表了开官智的进步方向，其暂时退却并不代表永远失败，所以庚子事变后，清末新政中，西学课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开官智言论的主流。

二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涉及各个层面，规模宏阔，开官智言论在新政的刺激下达到了高潮。决策与执行这样一场改革，官员素质的高下成为关键性的因素。这一时期统治阶层思想高度一致，在庚子之难的沉重打击下，清朝统治者再也不敢死守祖宗成法，大讲“西学误国”了。清廷下诏改革时虽仍然强调“不可变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但同时又指出，变革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并严饬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皮毛”而“舍其本源”。当然其对西学“本源”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却突破了仅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制造器械”的局限^③。可以认为，庚子之役后，西学假坚船利炮之威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跟，从此，西学开官智成为开官智言论的主线。但也正因为如此，新政初期的开官智言论出现了不加拣择、全面引进西学教育官员的特征。

袁世凯于1901年4月25日应诏陈言，提出“教官吏”的主张：在京师设课官院，“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中选取官员入学，学习内容除“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外，还包括各国约章公法及“一切西政、西史”。在各省“分设课吏馆”，令候补人员入馆学习吏治、时务、交涉等课程。同时袁还提出派王公大臣出洋游历的建议。游历人员“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以期对“外洋情形，均得要领”，“濡染既久，智慧日生”，于新政、交涉均有益处^④。

①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649页。

②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1998年，第1409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4601页。

④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天津图书馆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272页。

同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联衔会奏的《江楚变法三折》勾勒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基本改革框架。在开官智问题上,张、刘首先指出,在“事变日多”的形势下,京外各衙门官员“欲济世用,非学无由”。他们建议在“京城设仕学院,外省均设教吏馆”,令候补各员与“实缺各官愿入馆讨论求益者”入馆学习。馆内“多储中外各种政治之书,凡中外舆图、公法条约、学制、武备、天算、地理、农、工、商、矿各学之书,咸萃其中”^①。他们所列举的学习内容,从政治到法律,从科技到经济,门类可谓齐全。这种学习西方的不加拣择性充分体现了张、刘等人以西学改造官吏的急迫情绪。《三折》还继承并发展了张之洞在洋务时期提出的派官员游历的主张,具体提出游历之员要“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②。其所提游历考察内容涉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层面。

京师大学堂于庚子之难中被毁,新政之初大学堂重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1902年1月10日,吏部尚书张百熙奉旨着手大学堂的重建工作。2月,张奏准在大学堂设仕学馆教育“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各官^③。同年4月5日,直督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刘坤一奏请在京师设立仕学院并附立讲论会,“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林、科道、部曹与夫在京外官”入院学习,并提出“访求外国通儒及致仕闲居人员”聘入讲论会作为讲友,为院中各员讲论以启官员之智^④。应该说,讲论会的构思颇有新意。12月1日,清廷以“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为理由,规定从癸卯年会试开始,“凡一甲之受职修撰、编修、二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⑤。这样就促成了进士馆的设立。

1903年12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制定的《进士馆章程》颁布。该章程强化并凸显了此阶段全面学习西学的特征。《章程》规定进士馆“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澈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进士馆以“果”、“达”、“艺”三科教育新进士:史学、地理、法律、教育、理财、东文、西文属“达”科,兵政、体操属“果”科,格致、算学、农学、工学、商学属“艺”科。“果”、“达”、“艺”三科,中西兼有,偏重西学,这从进士馆三年

①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1页。

②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31页。

③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4册卷二十八,上海崇文堂校(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第2页。

④ 张之洞:《请饬在京特设仕学院并附立讲论会折》,天津图书馆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另据《直督袁江督刘鄂督张会奏请立仕学院折》(邓实辑:《光绪壬寅(廿八年)政艺丛书》,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279页)可知该折为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三人会奏。

⑤ 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一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第7页。

总课程表上可以看得出来,除第一学年《中国地理》与第三学年《中国法制考大要》研习中国地理与法制之外,其余科目40余门均为西学或偏重于西学,并强调“所列各科学均系当官必须通晓之学,不能再减”^①。这些课程几乎包括了当时能接触到的所有西学知识。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尤其是宪政之日本对专制之俄国的胜利,深深刺激了中国,立宪救国言论充斥朝野上下。这一言论作用于开官智,则激起了法政课吏的高潮。1905年4月,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请设立“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同时请“在各省课吏馆内添设仕学速成科讲习法律”^②。学务大臣在议复时对此意见表示了赞成。

在法政课吏高潮中,袁世凯首先在直隶创办了法政学堂,让治内年在45岁以下候补人员入堂学习“政治专门”。

1906年后,官方几乎无人再就此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其原因主要是经过新政初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努力,对于官员培训的原因、意义已没有再行探讨的必要,而此时已逐渐成熟定型的三种官员培训形式除需进一步完善之外,也失去了推倒重来的设计可能。思想已为具体实践所取代,开官智作为一种思潮在官方层次上开始退潮。

综观清末新政时期统治阶层的开官智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其明显带有焦灼与慌乱的特质。比如《进士馆章程》把占课时绝大部分的西学知识强分为“果”、“达”、“艺”三科,要求学员三年内掌握;法政学堂的课程又包括了宪法在内的行于当世的几乎所有的法律,且别科与讲习科均为速成。这种焦灼与慌乱是在深重国难面前全国上下急切救亡情绪的自然反应。这种情绪使他们无法静下心来,根据国情提出吸收西方文明的有效方法。因此,在这种言论作用下的开官智运动,便出现了盲目与食而不化的特征,因而未能挽救清政府的覆亡命运。

三

清末新政时期,对于开官智的思考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专利,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是此一时期开官智言论的重要特征。

1902年,《大公报》创刊伊始,便掀起了以开官智为中心的讨论。据《大公报》馆自陈,报馆是由于收到了友人来信而决定发起这场讨论的。“友人”云,“开官智其难百倍于开民智”,官员“其流品太杂,其习气太深,总而言之,不外乎自大自是,自私自利八字。不知强存弱亡为何解,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其品行之卑,其见识之谬,甚至有不如下平民者”。为此,该“友人”提出以“多读书”作为开官智之法。报馆认为“开官智尤急于开民智,以其风行草偃,上行下效也”,并特别强调“开大官之智尤要于开小官之智,以其行使止泥政令所由出也”。然而,对于开官智之法,报馆并不认为“多读书”就可以解决

^① 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二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第59~60页。

^② 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三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第9页。

问题：“王荆公岂非多读书者？奈其博学泥古何？即今误国害民如端、刚辈固坐不读书弊，然其中推波助澜者亦不乏翰林起家文华彬郁者，是‘多读书’三字便为开官智亦不能赅括之也。”报馆认为，开官智一事太大，“为通国兴衰存亡之所系，凡我国民皆所极当措意者”，因此发出呼吁：“请海内痼疾在抱诸君子各贡所知以备当道采择，冀以挽颓风而固国本。”为激起大家讨论热情，彰显话题意义，报馆痛斥“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而尚一味颂扬阿谀为希宠邀荣之计者”为“卑鄙无耻、丧心病狂”，指责“明知时局烂坏而缄嘿隐忍不敢道其只字者”为“不智不仁不勇”。作为报馆，其“义务在辅政治、维风俗、开民智、达下隐”，如果“唯阿可否人云亦云或月露风云嬉笑怒骂”，则“无裨于世道有害于人心”^①。因此，大公报馆认为自己有责任发起这样的讨论，故发出征稿启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开官智”的讨论文章。

《大公报》对开官智的讨论，是以“寓津绩溪胡协仲”与“津门清醒居士”（以下简称“居士”）二人的论战开始的。胡协仲著文认为，官智锢蔽是中国萎靡不振、几欲沦亡的原因：“上而王公大臣，外而府厅州县庸愚昏聩、蔽塞心胸、崇信邪辞、倡言异说，酿千古未有之奇祸，阻支那向化之新机。”因此，他得出结论“欲行新政，必开官智”。在胡氏看来，清廷停捐之谕、课吏之馆^②并未收到效果：“官之昏愚如故也，偷惰如故也，保举之滥如故也，钻营之巧如故也。”中国官智锢蔽太深，开官智必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基于以上分析，胡氏提出了四种开官智方法。第一，严格课吏，收取实效。胡分析认为课吏馆毫无效果是由于“虚行故事、敷衍塞责”之故，必须严格考核以收实效，并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学习与“本省之情形”结合起来。第二，设官报以开风气。胡认为“一人精神有限”，欲周知世界难乎其难，游历耗资太大，最好的办法是“设官报局一所，综东西各报纸采其精华去其糟粕”，令官员阅看，即可知世界大势^③。第三，裁差役以去积弊。“差役一日不去，官智一日不开。”胡提出仿通商口岸建立现代巡捕制度以代替旧式胥吏的主张。此观点在当时颇有新意。第四，禁吸烟以增才智。“如是则各员咸存自爱之心力图振作”，坚持数年，官智即可大开^④。

两天后，《大公报》又发表了居士的《开官智法》。居士亦认为中国“欲伸国权必速变法，欲速变法必开官智”。他将沾染官场积弊的官员分成两类：一类明知国权不振急须变法，但恐变法要“剔除老朽腐败之人”，为保证自身禄位而痛诋变法；另一类不识时事，盲目自大，认为义和团“不能平洋人为时候未到”。居士认为第二类官员不智尚可“设法开之”，对第一类官员则毫无办法，必须“驱除净尽”，否则，胡协仲提出的“严课吏、设官报、裁差役、禁吸烟”等开官智法均毫无作用^⑤。

居士认为开官智有六件必不可少之事，就在这六件必不可少之事上，胡协仲与居士展

① “论说”，《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

② 胡协仲发表这篇文章时，全国已有课吏馆开始运作，详见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一文，《中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寓津绩溪胡协仲未定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7月29日。

④ 寓津绩溪胡协仲未定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

⑤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开了论战。

在居士看来,开官智之先有必不可少二事。一为请皇上亲政。居士认为皇上亲政则可驱除第一类官员,“此为开官智之一大枢纽”。二要“复用戊戌废员”。居士认为如果戊戌新政未被废除,国权早已大振,官场也不会一烂如是^①。对于这两点主张,胡协仲认为很难做到。胡分析到戊戌以后只有吴保初一人上折请求归政皇上,却为政府所遏抑不能上达两宫,致使志士言官不敢再“道及只字”。至于复用戊戌废员尤其不可行,因为戊戌变法在当时朝廷眼中仍为“异端”,无人敢保荐戊戌志士^②。抛开二人分歧,若客观分析居士的两点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戊戌变法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情,正如他所谓“戊戌之变法中国之福也”^③。但他认为“官智开不开视乎皇上亲政不亲政”^④,将皇上亲政视为开官智之先决条件未免太过武断。而当时的康、梁等人仍为清廷通缉要犯,复用戊戌废员也显得幼稚。

居士认为开官智之时亦有二件必不可少之事。一开仕学院让各省候补人员入院“学习内治外交一切事宜”,三年毕业。但毕业后仍不能补缺,还须办第二件事,即“游历外国以练其才识,以扩其心思,以广其见闻”,回国后经严格考核再授以实官^⑤。对此二点,胡协仲表示了赞赏,认为仕学院即自己所谓课吏馆,而“出洋一年胜如阅书十年”,游历后再任实官将大益于开官智^⑥。二人都充分认识到了官员游历的重要性,可见以西学开官智在舆论界确实大有市场。

开官智之后尚有二事。一厚俸禄以养廉耻。居士认为“智已开矣,官已实授矣”,下一步就须防其贪劣,欲防其贪劣则须先养其廉耻,欲养廉耻则须厚给其俸禄^⑦。对此胡协仲表示了异议。胡认为厚俸不可行是由于“款无所出”,实施新政在在需款,“百利不兴而遽益以巨款,此厚俸禄之为难者也”^⑧。今天看来,高薪养廉的想法是不错的,但当时的确是不具备此等条件。

居士认为开官智后第二件必不可少之事为阅日报。他首先对胡协仲所倡设官报提出批评,认为官报“势必严定一例,凡触犯忌讳之事概不登录”,因此“阅报如不阅也”。欲周知民情,应该阅“民间私立之日报”,“其议论一秉大公,绝无粉饰偏激之事”,于开官智大有裨益^⑨。对此,胡协仲反驳道:“官报由督抚札颁”,“权操乎上”,不得不阅,而“日报由各员自备”,“权操乎己”,则可阅可不阅。因此在官智大兴之前,只有政府强令阅报方可收实效,从此角度视之,官报优于日报。且官报体例不一定就不能与日报一律,官报

①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② “来函”,《大公报》,1902年8月7日。

③ 津门清醒居士稿:《戊戌政变说》,《大公报》,1902年8月6日。

④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⑤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⑥ “来函”,《大公报》,1902年8月7日。

⑦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⑧ “来函”,《大公报》,1902年8月7日。

⑨ 津门清醒居士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亦可“一秉大公”^①。

胡与居士的论争掀开了《大公报》“开官智”大讨论的序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对“官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有文章提出“以西人开官智”的主张。该文认为中国贫弱是由于“满汉人之智实出西人下耳”，于是提出“仿照日本维新之法，一切要津之地除用本国游历学生外，则聘用西人以为之措施”；待新政通行于全国以后，再谢去西人专用本国学生。具体方法是如满汉并用之例，于京、外各衙门“置西人一员”，如是“则官智不待开而自开矣”。文章认为这是学习西政西学的最好办法。但文章还认为华尔、戈登、赫德等人忠于中国，说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竭诚为中国服务^②，这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还有文章提出开官智要以变官制为条件。“智之为物又愈用而愈开，愈不用而愈塞。”中国旧官制相沿已久，官场习气深重，官员遇事推诿扯皮，“无暇用智，官智之不开也”。改革官制，裁汰冗官冗衙，让官员各有专门责任，“则其出一令也布一政也，在在皆用于智而后开”，官智自然可开矣^③。文章能认识到官智不开根源在于旧的封建官制，还是相当有见地的。群满汉亦为开官智之重要条件，“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此商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因此合群力是治国善策，亦是开官智之要义，“有群力然后有热力，有热力然后有爱力，有爱力然后智乃大开”。所以，开官智必须平满汉畛域^④。

也有文章专门讨论官智难开的原因，并将其总结为六条：仕途滥杂、缺乏政治精神教育、例规繁复、官员嗜好太深、禄位之念太重、迷信鬼神邪说。该文认为正是此六条原因，中国官员智识锢塞，以致与列强抗争时一败涂地。^⑤ 这几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官场实际。

1905年，立宪风潮大炽。4月15日，有人撰文提出，于课吏馆内仿法政科大学科目增加课程钟点，让旧式官员熟习政法知识^⑥。两天后又有文章分析“讲法政以维持将来之吏治”的重要意义^⑦。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牧民忠告》指出：“欲实行立宪非改良政治不可，欲改良政治，非先澄清仕途不可。”欲澄清仕途首要的是要选好牧令，对牧令实施教育^⑧。随着自治运动的高涨，异地为官无法熟知当地情形的弊端暴露出来。因此，以本地人为本地官，“以期熟悉地方情形风俗”^⑨，不致被吏胥蒙蔽，则官智又可一开。

《大公报》的努力得到了舆论界的呼应，《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开始发表有关开官智的

① “来函”，《大公报》，1902年8月7日。

② 先忧后乐生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19日。

③ 瓠山金四郎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9月24日。

④ 瓠山金四郎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9月25日。

⑤ 《论官智之难开》，《大公报》，1903年9月24日。

⑥ 楚碧：《清宦途策》，《大公报》，1905年4月15日。

⑦ 史侠镜：《清宦途策》，《大公报》，1905年4月19日。

⑧ 《牧民忠告》，《大公报》，1905年12月8日。

⑨ 《论本地人作本地官》，《大公报》，1905年12月18日。

文章。1906年,第十期《东方杂志》节录了第一期《环球中国学生报》的《学界刍言》一文,提出了“改良课吏章程”的主张。文章认为各省课吏馆多流于形式,“潜心研究者十无一二,迎合枪替者十有八九”。课吏馆成了官场又一贪缘关节之处,应选出洋学习法政的本省学生为教师,编定讲义、课本,将学员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讲授,并严格考课。^①文章表达了当时对课吏馆的不满及对法政的向往。该年《东方杂志》临时增刊还摘登了广州《羊城日报》的议论,指出欲立宪必须开民智,“养成国民智识之程度”。但当时形势是“不惟民智未开,即官智亦未开”,“内外大小官吏且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何能遽责诸民”?因此,“欲养成国民智识之程度,尤当先养成官吏智识之程度”^②。表达了立宪须从开官智入手的思想。当时甚至还有报纸以开官智为己任,如《中华报》就声称,办报就“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③。

从总体上看,以《大公报》为中心的社会舆论界人士,对开官智的认识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说出了一些统治阶层所不敢说的话,如对官场积习的抨击。其实开官智第一步当然是要认清官智不开的原因所在,官场的腐烂积习虽还不是官智不开的真正根源,但也是造成官智低下的重要原因,《大公报》对官场积习的揭露,触动了官员群体不愿揭示的疮疤,有利于更好地教育官员。

第二,提出了一些上层人士不曾或不愿提的主张,如要求开“大官”之智。其实清末新政时期的开官智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对高官大吏的教育问题。处于高位的统治阶层在传统“吏为民师”思想的影响之下,不愿承认自己智识低下的现实,他们对于开官智的设计总是针对中下层官员或手无实权之翰林进士、赋闲贵胄。《大公报》等媒体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其强调了“开大官之智尤要于开小官之智”^④的理念,甚至还有作者专门著文探讨过对台阁督抚的教育之法^⑤。

第三,媒体舆论客观上扮演了开官智运动监督者的角色。如《大公报》、《环球中国学生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对设立课吏馆等开官智措施的报道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开官智运动起到了矫治与推动的作用。

第四,舆论界与高层认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重视西学的作用。让官员游历、以西人开官智、阅报以了解世界大事等都表明了舆论界重西学的偏向。

第五,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多以报刊为载体,社会影响面大,容易形成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使得开官智言论与开官智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近代的某些特征,如无法毫不顾及民心民意的向背而仅靠长官意志去推行。这一点可能既是近代启蒙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启蒙的进程。

① 《学界刍言》,《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第十期,“教育”,第242页。

② “舆论一斑”,《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临时增刊,第17页。

③ 转引自杨早:《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 “论说”,《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

⑤ 热心热血生稿:《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10日。

四

以清末新政的推行为界,清季开官智言论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洋务到戊戌时期为第一阶段,开官智思想存在着中学教官还是西学课吏的争论,且争论局限于政治高层,社会影响不大。清末新政时期为第二阶段,从王公大臣到一般士大夫,从统治中心到社会舆论,西学开官智成为共识。在日益急迫的内忧外患面前,统治阶层的焦灼与慌乱和社会舆论的策应与批评共同构成了清末开官智言论的壮阔图景。

清末开官智言论波及面广,参与面大,自一品大员的政策设计到一般士绅的呼吁,再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与督促,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声势。这种广泛的参与,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开官智的期待与重视。官智于民的传统思想、内忧外患的时局以及官员面对内忧外患时局所表现出的实际的无能是开官智言论出现的三大因素。救亡需要改革,改革需要人才,旧式官员不懂新学,则“教之而已矣”^①;救亡需要启蒙,启蒙就要开民智,而“开官智尤急于开民智”^②,这便是开官智言论的内在逻辑。

“开官智尤急于开民智”是否是清末各界的共识,尚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而且考虑到历史面相的极端复杂性,高度“共识”的东西几乎不可能存在。但是,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开官智急于开民智得到了当时各界相当大程度上的共鸣却是不争之事实。也是在这一点上,在当时启蒙的大语境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舆论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不论政府高层提倡开官智是否存在“要把改革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原有的统治阶层手中”^③的深层目的,其对开官智的倡导及其主导的规模颇大的开官智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近代早期启蒙的主题,在当时中国特殊国情下,让官员学习西学,以官智推动民智当然也应该是启蒙运动的可行选择之一。

(徐保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山东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

①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② “论说”,《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

③ 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中国近代理想人格的话语诠释

——以辛亥前革命志士为中心

赵炎才

内容摘要 辛亥前，革命志士立足于近代政治诉求，赋予传统圣贤人格以近代义。他们理性继承传统圣贤人格的合理文化价值，积极清算其封建性弊端，理论重构近代理想人格的时代意涵。其具体内涵关涉近代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知识结构和实际能力等方面，实际对象由上层精英渐及下层民众。它们密切结合，彼此互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圣贤人格的近代嬗变。

关键词 辛亥前 革命志士 圣贤人格 理性继承 积极清算 理论重构 近代理想人格

在有关辛亥前革命志士思想研究中，近代理想人格^①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为止，相关学术研究对此虽不乏一定论及，而全面系统的剖析却仍有待深化。具体地说，这主要表现有三：忽略对其人格思想的考察、有所关注但比较单一、触及人格嬗变本质惜未具体展开。所谓忽略对其人格思想的考察，突出表现为部分学者论及中国近代理想人格思想及其流变时，对辛亥前革命志士的近代人格思想有所忽略。如有论者指出：“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人自身的近代化也成为引人瞩目的问题，它具体地体现于人格理想的转换上。相对于传统儒学所追求的圣人、醇儒，近代思想家所关注的，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格理想作了考察和设定。”^②另一探讨个性化人格问题的论者剖析道：严复等自由主义者和梁启超等思想家分别从独立品格、责任品格两个侧面突出揭示了个性化人格的内涵，但又存在一定局限和片面性。鲁迅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种研究路向都有所吸取，“在个性原则与集体原则统一基础上融合个性的独立、责任与创造品格，显示出建构现代个性化人格的合理趋向”^③。而一位着重探讨人格改造或重建的作者指出：“中国近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人格的改造或重建，即从依附差等的传统人格转变为自主平等

① 一般而论，近代理想人格主要包括狭义的精英人格与广义的大众人格两部分。而这里所指主要是狭义的从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的革命人格，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广义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理想国民人格。

② 杨国荣：《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③ 顾红亮：《论近代个性化人格研究中的三种路向》，《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